

大江匡衡诗文称引桓荣典故考论

吕天雯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 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汉诗文作者大江匡衡具有极高的汉文学修养,在诗文作品中他多次借用中国东汉名儒桓荣的典故阐述自己作为侍读的境遇与心志。他以桓荣典故为依托,画出了自己人生及心境起伏的轨迹。他对桓荣典故的接受有与中国古代诗文相通的一面,然而在经典词句的运用、游戏化的表达方式、与其它典故的结合运用等方面又与中国古代诗文存在着很大差异,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及文化在被日本文人接受过程中其作用的变异。这是由大江匡衡个人的生活经历及平安时代文人所处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的差异造成的。

[关键词] 大江匡衡; 桓荣; 侍读; 接受; 变异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1)06-0088-08

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的汉诗文作者大江匡衡(952—1012)出生于平安时代两大学问世家之一的大江家,自幼习读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具有极高的汉文学修养。其创作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是一条天皇治世时期(987—1011),这一时期是以平安时代文学的双璧《源氏物语》《枕草子》为代表的假名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同时“长保·宽弘”年间(999—1011)也被认为是平安时代汉文学的“再昌”^[1]期。藤原实资(957—1046)在日记《小右记》中评价大江匡衡“当时名儒无人比肩”^{[2]285},从中不难看出他在当时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平安时代汉文学作品集散佚严重,而其诗文集《江吏部集》相对完整地保存至今,部分诗文作品还收录于《本朝丽藻》《本朝文粹》等诗文总集中。可以说,他的诗文作品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对他及与他同时代文人的作品风格、境遇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目前学界对大江匡衡的研究多为诗文注释、传记、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对大江匡衡及其为代表的平安时代文人的境遇与精神思想的研究仍有待发掘。有鉴于此,笔者以其诗文中征用的桓荣典故为切入点,对这一论题做一个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大江匡衡对策及第走上仕途后,历任东宫学士、文章博士、尾张国守、式部大辅(相当于吏部侍郎)等,在诗文作品中他最乐于称道的身份之一是侍读。侍读意同侍讲,是指为皇帝或者皇子讲经授业的行为,亦指讲经授业的学者。侍讲制度始见于中国东汉,当时多用侍讲一词且并无官职,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侍读称号,唐玄宗时始设侍读之官职。^[3]平安时代侍读并非常设官职,一般由文章博士担任。大江匡衡永祚元年(989)三十八岁时成为文章博士,长德四年(998)四十七岁时担任一条天皇的侍读。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诗文中,他常常会借用桓荣典故来阐述自己作为侍读的境遇与心志。

大江匡衡是如何运用桓荣典故的?其运用方式与中国古代诗文中的运用方式有何异同?本文通

[收稿日期] 2020-12-20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平安时代童蒙读物整理与研究”(18WWC001)。

[作者简介] 吕天雯(1986—),女,山东泰安人,博士,南京工业大学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日本古典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过整理分析,揭示侍读身份对大江匡衡的意义以及平安时代文人的境遇,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及文化被日本文人的接受以及在此过程中其作用的变异。

一、桓荣典故及日本文人的接受路径

桓荣(生卒年不详),字春卿,东汉初期的儒者,其行实在《后汉书》中有详细记载。桓荣少时在长安学习《欧阳尚书》,新莽之乱后六十余岁时方因善讲《尚书》而受到光武帝的赏识,入宫教授皇太子即后来的汉明帝,并升为太子少傅。汉明帝即位以后,对桓荣尊以师礼,恩宠甚渥,永平二年(59),三雍初成,拜桓荣为五更,封关内侯,食邑五千户。桓荣死后,其子桓郁以先师之子身份受到提拔重用,侍读汉章帝、汉和帝。桓荣是《后汉书》中明确记载的唯一一位被帝王以师礼厚待、封侯赐邑且父子皆为帝师的儒者。他以帝师身份被汉明帝厚待的故事、升为太子少傅时勉励学生“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4]1251}的故事、子承父业俱为侍读的故事等都被传为佳话,并作为“桓荣典故”的不同侧面成为后世诗文征引的对象。

东晋葛洪(283—363)在《抱朴子·勤求》中,为了强调要学习营求长生的道法必须要敬重明师,就引用了西汉夏侯胜、张禹和东汉桓荣被帝王以礼厚待的典故,指出他们虽不能征战沙场开疆扩土,但凭借讲授经书学术,贵为帝王的人也要屈尊奉侍他们。关于桓荣典故,《抱朴子》引用了汉明帝即位以后驾幸太常府,令桓荣东面而坐,会百官及桓荣门生数百人,并亲自捧书求教,以及桓荣生病时,汉明帝驾幸桓荣府邸,如桓荣弟子一样入巷下车,并封侯赐邑的故事。^[5]

南朝任昉在为吏部尚书范云(451—503)创作的辞谢封侯的奏文《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中,为了表现范云以不足以胜任为由婉拒封侯的谦虚姿态,指出“近世侯者,功绪参差”^{[6]1737},列举了两汉时期获封侯位者的事迹,其中,他提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师道如桓荣”^{[6]1738},无疑是借用了桓荣侍读汉明帝以帝师身份获封关内侯的典故。

桓荣典故在诗作中比较少见,现存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诗作中,仅存南朝梁代刘孝威(生年不详—548)《奉和简文帝太子诗》,诗中“仙气贻钟相,儒道推桓荣”^[7]一句,借用桓荣形象的同时,凝炼地概括了桓荣作为儒者首屈一指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全唐文》收录的公文、传论中则多见桓荣以帝师身份受到厚待、桓郁子承父业、桓荣以“稽古之力”勉励门生的典故。如唐玄宗为奖励侍讲《礼记》的褚无量以及辅佐自己即位的张说而发出的制诰《封张说褚无量制》中有“夫爵有德,封有功,眷彼茂勤,宜宏赏典。以桓荣之稽古,况萧何之指踪,是用钦若朝经,差其并赋”^{[8]238}一段。唐玄宗以褚无量比之桓荣,强调了赏赐褚无量的依据以及必要性。李翰为凤阁侍郎王缙创作的《凤阁王侍郎传论赞》中,有“父子儒学,桓荣与桓郁相承。兄弟文章,陆机与陆云齐举。未足以延兹家范,丽我门辉”^{[8]4387}一段,概述了王缙家族自周至唐的发展历程之后,举出了桓荣桓郁父子及陆机陆云兄弟的典故,以其家族历史短暂反衬王缙家族家史久长。《全唐文》中可以看到十二例借用桓荣典故的文章,都是将桓荣典故作为先例来借古喻今以增强文章说服力。

大江匡衡是如何学习到桓荣典故的呢?他对桓荣典故的运用是否与中国的诗文有关联呢?大江匡衡“七岁初读书”“十有五入学”,^{[9]387}他在十五岁进入中央官学大学寮的纪传道后,按照学制要求会学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国正史以及《文选》等文学作品,在诗文创作过程中也会受到《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的影响。因此,见于《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初学记》中的桓荣典故对于平安时代的文人尤其是大学寮纪传道出身的文人来说,应当是比较熟悉的。

在现存的大江匡衡以前的平安时代的文献中,桓荣典故还见于菅原道真(845—903)的诗文中。《八月十五夜严阁尚书授后汉书毕,各咏史得黄宪》序文中有“知籀金之假珍,感琢玉之真器。稽古之

力,不可较量”^{[10]114}一句,《博士难》中有“已知稽古力,当施子孙荣”^{[10]175}一句,虽然没有出现桓荣的名字,但从诗题中所示《后汉书》的读书背景不难看出菅原道真也受到了《后汉书》的影响,“稽古力”一词应当是借用了桓荣的典故。可以说桓荣典故是在平安时代中期以后才逐渐为日本文人使用的,而在与大江匡衡同时代的文人作品中,运用桓荣典故的文章并不多见,可见桓荣典故在大江匡衡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大江匡衡诗文中的桓荣典故

大江匡衡的诗文中出现桓荣的名字、明显借用桓荣典故的作品有十一篇,“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11]614},或“举人事”^{[11]614},或“引成辞”^{[11]614},或单纯借用桓荣形象以抒发心志。

1. 举人事以待举

“举人事”,即列举旧事,大江匡衡在诗文中通过列举桓荣所受汉明帝的礼遇及其子桓郁继承家学父子俱荣的史实以上谏天皇重用自己,表现出了他对获得天皇认可的渴望。宽弘三年(1006)大江匡衡为一条天皇侍读《老子道德经》,在其有感而发所创作的诗文的长诗题中,他写道:“彼桓春卿之侍五更之问,其家百官会。张子房之为一卷之师,其位万户侯。方今圣日彻于九流,文风熏于十方,我后君招贤才,请先从隗始,我后君兴文道,莫使朝臣饥。”^{[9]385-386}他列举了桓荣与张良受到君主礼遇的典故,并且借用《战国策》中燕昭王听取郭隗的建议重用郭隗以招揽贤士的典故,劝谏一条天皇能从厚待自己开始招纳贤才,重视文道。

“桓春卿之侍五更之问”很有可能是“桓春卿之待五更之问”的传抄错误,意为被汉明帝封为“五更”的桓荣应对汉明帝的疑问。在《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赞文中有“五更待问,应若鸣钟”^{[4]1269}一句,大江匡衡应该是据此而作。“其家百官会”则是指《后汉书》中记载的汉明帝临幸时任太常的桓荣府邸,会百官及桓荣门生数百人的典故。“子房为一卷之师,万户丰大其赏”一句借用了西汉张良的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从黄石公处得到“读此可为王者师”的《太公兵法》,利用此书为汉高祖运筹帷幄,汉高祖为称扬其功绩,赏三万户食邑,封为留侯。^[12]在这一段中,“五更之问”与“一卷之师”“百官会”与“万户侯”形成了鲜明的对仗,表现了汉明帝对桓荣、汉高祖对张良的尊师厚遇,同时也表达出了大江匡衡对被一条天皇重用作为帝师的自己的期许。

宽弘六年(1009)大江匡衡以尾张国国守及侍读的功劳申请任职美浓国国守,在申文《请特蒙天恩依尾张国所济功并侍读劳被拜美浓守阙状》中写道:“侍读之劳十二年,侍读之书三百卷。春卿应五更之问,万乘临幸其门。子房为一卷之师,万户丰大其赏。承和之侍读文章博士菅原清公卿者,乘车马出入禁中。应和之侍读中纳言大江维时者,陪帷幄昵近天颜。皆是倭汉之圣主明王之崇文严师之异赏殊私也。”^{[13]223}他列举了中国的桓荣、张良和日本的菅原清公、大江维时等受到君主优待的事迹,强调了中国与日本的圣君明主尊师崇文的姿态。申文是平安时代文人向天皇申请官位的一种文体,大江匡衡强调“倭汉之圣主明王之崇文严师之异赏殊私”的目的,无疑是希望读到申文的一条天皇能够效仿古今中日的圣主明王,眷顾作为帝师的自己,让自己成功获得所申请的官职。他在自传性质的诗作《述怀古调诗一百韵》中说自己晚年“闲居阅史书”,也提到了“桓荣五更问,万乘临幸联。张良一卷师,万户功名镌”^{[9]388}。大江匡衡从壮年至晚年在诗文中不厌其烦地使用桓荣与张良的典故,其意图显而易见是抒发渴望获得一条天皇礼遇的心志,借古讽今以达圣听,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帝师身份的骄傲以及对位列公卿之位的执著。

桓荣典故还出现在他因儿子举周(生年不详—1046年)获得官职而创作的诗文中。宽弘三年(1006)三月四日,大江匡衡参加一条天皇举办的暮春花宴,承担了作序及讲诗的工作,席间藤原道长

传达敕语,补匡衡之子举周为藏人即天皇的近侍,欣喜之余,大江匡衡创作了一首诗,其中尾联“桓郁侍中荣不见,江家眉目有时开”^{[9]384},借桓荣去世以后桓郁才被起用为侍中的故事,反衬自己能够看到儿子举周获得近侍天皇的重要官职、大江家的荣耀得以为继的骄傲。

2. 引成辞以显功劳

“引成辞”,即引用典故中的辞句,主要表现在“稽古之力”一词中。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桓荣升为太子少傅时,光武帝为奖励其善讲《尚书》之功,赐予他辎车、乘马,他遂召集诸门生,将所赐车马印绶陈列在门生面前,说道:“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4]1251}桓荣认为自己依靠“稽古之力”获得封赏,所以陈列封赏以勉励门生。“稽古之力”也就成为了学问的工力的代名词,并为后世所沿用。

宽弘元年(1004),大江匡衡升为式部大辅,并兼任尾张国国守。这一年春末他创作了一首八韵诗《暮春应制》,在前两联中,他咏道:“四十六年人未识,烟沦墨沼懒抽毫。幸逢北阙仁心厚,遂使春卿礼秩高。”^{[9]376}在首联中叙说了自己四十六岁以前没有得到天皇的赏识、意志消沉的过往,在颌联中表达了自己如今有幸遇到仁心宽厚的君主,遂如春卿即桓荣一样受到礼遇的欣喜之情。在颌联后,大江匡衡添加了自注说到“匡衡四十七,初听升殿,兼侍读,去年再预加階,稽古力也”^{[9]376},说自己四十七岁时被允许登殿并兼任一条天皇的侍读,四十六岁时官位升阶,这都得益于“稽古力”。

大江匡衡多次在诗文中用到“稽古之力”这一语典。例如,前文提到的他在申请美浓国国守的申文中写道:“望请殊蒙天恩,依尾张国所济功并侍读劳被拜任件国守阙,将知稽古之力……”^{[13]223}希望天皇能够满足其申状的请求,任用自己为美浓国国守,让群贤知道学问的价值及天皇对学问的重视。

3. 借形象以自比

除了“举人事”“引成辞”的手法以外,大江匡衡的诗文还有单纯借用桓荣形象以抒发心志的手法。现存大江匡衡的诗文中,最早提及桓荣形象的是长保元年(999)十月于敦道亲王(981—1007)举办的诗宴上创作的句题诗《七言初冬于都督大王书斋同赋唯以诗为友应教诗以情为韵》。在尾联中,他对句题“唯以诗为友”中的“诗”“友”进行阐发,联想到《诗经》及著名中唐诗人白居易和元稹,咏道:“逢遇携来元白集,争教匡鼎类桓荣。”^{[9]390-391}两句意为:白居易和元稹的《元白集》传到日本,上自天皇下至群臣都喜读元诗白诗,生逢这样的时代,善讲《诗经》的匡鼎即匡衡怎样才能像桓荣一样获得君主的礼遇呢?白居易、元稹的诗文作品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已有众多先行研究,在此毋庸赘述。“匡鼎”是西汉经学家匡衡的幼名,《汉书·匡衡传》介绍匡衡善讲《诗经》时说:“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14]3331}大江匡衡借用与自己同名的汉代经学家匡衡的幼名“匡鼎”代指自己,表达以儒学为业却生不逢时、不能像桓荣一样获得君主厚遇的郁闷。这与他在诗序的结尾部分说自己“隔贤路千万里,疲骖殆黄焉。游诗境四十年,学鹿未白矣”^{[9]390}形成了呼应。虽然这首诗并非在天皇面前所做,但他这时已经担任一条天皇侍读了,因诗题而生志,表达了希望能够获得一条天皇尊师礼遇的心情。

长保二年(1000)十月,为了庆祝毁于火灾的皇宫的重建,一条天皇回到新建的皇宫后举办了以“燕雀相贺”为诗题的诗宴,大江匡衡作序,在诗序的末尾写道:“匡衡所事之主明天子,渐发春卿之荣。所学之师文宣王,聊干子游之禄。”^{[9]400}指出自己遇到圣明的一条天皇才逐渐像桓荣一样获得荣耀、以儒学获得俸禄,在厚赞君主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春卿之荣”一词,由“春卿”之“春”字联想到春天草木发荣,有欣欣向荣之感,又借用桓荣被汉明帝尊以师礼、封侯赐邑的典故表现出自己获得天皇认可的荣耀与骄傲。

长保三年(1001)三月大江匡衡赴任尾张国国守,在给藤原行成的书信中写道:“抑赴任之日,近召御前,赐以温谕之纶言,示以圣臬之骏驹。人惊耳目,道施光华,荣于桓荣,尚于吕尚。彼西曹始祖营

清公者,贞观侍读也,听乘车出入宫中。此东曹末儒江匡衡者,长保侍读也,得赐马进发城外。君之崇师,古今如此。”^{[13]245}他叙述了自己赴任之前受到一条天皇的召见,一条天皇赐以温言及骏马的经历,并将自己的经历与担任仁明天皇(833—850年在位)侍读的菅原清公(770—842)被准许乘牛车进入宫内的特别优待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古今天皇尊师的表现。吕尚,即吕望、姜太公,垂钓于渭水之滨遇到狩猎出行的周文王,被周文王起用为太师。“荣于桓荣,尚于吕尚”是指大江匡衡认为一条天皇的赏赐让自己比名字中带有“荣”字的桓荣还要光荣,比带有“尚”字的吕尚还被尊崇。大江匡衡将桓荣与吕尚作为受到厚遇的帝师的典范,从其利用文字多义性的游戏化的表达方式中不难看出其获得一条天皇封赏的欣喜之情以及超越古人的自负。

这种自负也见于宽弘二年(1005)大江匡衡为一条天皇的皇子敦康亲王(999—1019)侍读《御注孝经》时创作的《冬日侍飞香舍听第一皇子初读御注孝经应制一首》中。大江匡衡欲扬先抑,咏道:“吕望授来文武学,桓荣独遇汉明时。”^{[9]389}先列出吕尚被周文王、周武王两代君主奉为帝师、桓荣只为汉明帝一代帝王之师的历史典故,继而咏道:“幸传延喜明时例,天子储皇皇子师。”^{[9]389}讲述自己延续祖父大江维时在醍醐天皇时的传统,为一条天皇、皇太子即后来的三条天皇(1011—1016年在位)及敦康亲王三人侍读讲经的经历。通过与吕尚、桓荣的对比,表现出了祖父维时与自己超越历史人物的自负及对待读家风的骄傲。

但同样是宽弘二年(1005)创作的作品,其意旨却不尽相同。大江匡衡在重阳诗宴上创作的《七言重阳侍宴清凉殿同赋菊是花圣贤应制诗一首以情为韵》诗序中写道:“但惭地芥难拾,追责夏侯之虚词。天恩是冯,强仰春卿之前迹。”^{[9]397}他由诗题“菊是花圣贤”联想到自己的境遇,借用夏侯胜教导门生说“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14]3159}的典故,表达自己深耕儒学却未能获得“青紫”即高贵的公卿之位的遗憾,只能瞻仰桓荣的事迹,期待天皇的重用。

大江匡衡对桓荣典故的使用,不仅用于表现自身对获得天皇认可的渴望,还反映了其对待读家风的重视以及对儿子继承家业的期待。在为一条天皇侍讲《白氏文集》、为《白氏文集》添加训点时抒发感慨创作的一首诗中,他咏道:“研朱仰凤点文集,汗竹割鸡居武城。若用父功应赏子,老荣欲拟昔桓荣。”^{[9]386}前两句中,大江匡衡阐述了自己的功劳:一是为《白氏文集》添加训点、为一条天皇侍读《白氏文集》,二是同《论语·阳货》中所载的任武城宰励精图治的孔子弟子子游一样,自己也被任命为地方官吏任尾张国国守。在后两句中,大江匡衡抒发感慨说自己愿意效仿古代的桓荣,希望一条天皇能像重用桓荣之子桓郁的汉明帝一样,举用自己的儿子举周。从这首诗的诗题中可以得知他产生这种愿望的原因。他在长诗题中写道:“延喜圣代、千古维时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历圣代、维时齐光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禄御宇、齐光定基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爱当今盛兴延喜天历之故事,匡衡独为文集之侍读,举周末遇升,欲罢不能,以诗慰意。”^{[9]386}他由为一条天皇侍读《白氏文集》,联想到曾祖父千古(866—924)与祖父维时(888—963)、祖父维时与叔父齐光(934—987)、叔父齐光与堂弟定基(生年不详—1034)都曾父子俱为天皇侍读,而自己的儿子举周仍未被举用。这里并没有出现桓郁的故事,仅是从父亲的视角,表达效仿桓荣、希望天皇能以自己的功劳封赏举周,延续大江家一直以来的侍读传统的心愿。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大江家家风传统的重视以及期待儿子早获知遇之荣却仍未实现的内心纠葛。

由上可见,在大江匡衡的诗文尤其是以侍读身份创作的诗文中,大江匡衡对桓荣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桓荣成为其帝师典范的象征以及个人崇拜的对象。他借用桓荣典故,在失意时表达对获得君主认可的期待、对家业无以为继的担忧,在得意时表达获得天皇尊师礼遇的欣喜、自负,以及对未来仕途的信心。可以说大江匡衡以桓荣典故为依托,画出了自己人生及心境起伏的轨迹。

三、侍读身份对于大江匡衡的意义

大江匡衡对桓荣帝师身份、以“稽古之力”受到帝王礼遇的典故的关注,与中国古代的诗文是相通的,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诗文多将桓荣典故作为史实看待,而大江匡衡关注《后汉书》中的赞文、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关注桓荣的“五更”身份、采用游戏化的表达方式抒发心志、采用对句的形式将桓荣与吕尚、张良的典故联系在一起的手法则未见于中国古代诗文中,可以说是其独创的表现手法,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典籍在被日本文人接受过程中产生的运用方式及作用的变异。

这无疑是由大江匡衡“生活的期待视野”^{[15]12}所决定的。接受美学认为,接受者对作品的接受是以之前的经验所积累成的“期待视野”为前提的,“生活的期待视野”是指接受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包括接受者所处的地位和状况、生活经历与经验、价值观与道德观等。在大江匡衡借用桓荣典故的十一篇诗文中,有六篇是以侍读身份创作的,可见作为文人的大江匡衡对侍读身份的重视。另外,他在未见桓荣典故的其它诗文中也多次提到自己的侍读身份,如在《自爱》中咏道:“东海烹鲜遗教化,子城侍读仰殊恩。一言犹胜千言重,三百卷书授至尊。”^{[9]388}提及自己以三百卷书侍读天皇的经历。他在《仲春释奠听讲左传同赋养民如子》一诗中咏道:“我后养民如爱子,就中侍读异他人。”^{[9]389}说天皇爱民如子,其中作为侍读的自己得到的恩宠尤甚。大江匡衡为何在诗文中如此重视侍读身份呢?这与他的经历及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大江匡衡在《述怀古调诗一百韵》中追忆十三岁时举行的元服仪式时,说到:“十三加元服,祖父在其筵。提耳殷勤诫,努力可攻坚。我以稽古力,早备公卿员。汝有帝师体,必遇文王田。少年信此语,意气独超然。”^{[9]387}祖父维时在元服仪式上对匡衡耳提面命,说自己以学问之功位列公卿,预言匡衡有帝师之相,必定会像吕尚一样遇到赏识自己的圣君。祖父的话为匡衡指明了人生方向,使他受到鼓舞深信不疑,并因此意气风发。据此可以推测匡衡在少年时期就已形成了以儒学为业、以帝师为荣的目标。

祖父的寄语同时影响了大江匡衡对大江家儒学世家的家风传统的认识,使其从少年时期就萌发了要维持大江家传统的信念。在为其子能公申请以奖学为目的的学问料的奏状《请被给谷仓院学问料令继六代业男荫孙无位能公状》^{[13]230}中,他指出承和年间(834—848)菅原清公建立文章院,由菅原家、大江家分管学生宿舍西曹、东曹,此后大江家便作为学问之家迅速崛起。大江匡衡对大江家的发展历史的描述正是为了强调大江家的传统,反映了他身体力行地为其子举周、能公争取发展前途或者获得重用机会的精神源泉。这与当时“儒门的固定化”的风气、“随着世袭制度的确立,儒门栋梁不遗余力地让家中子弟继承家业”^[16]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承和时期是日本政治方面出现重大变革的转折期,藤原家族通过担任摄政关白掌控了朝政大权。摄政是指天皇年幼时太政大臣主持政事,天皇成年亲政以后改称关白。858年藤原良房始称摄政,887年藤原基经始称关白。这种政治上的变革导致“文人逐渐被排挤到政事决策圈以外,成为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职业文人”^[17],渴望得到官位的文人在奏文以及在诗宴等公开场合上创作的文章中表达怀才不遇、希求官职爵位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从《本朝文粹》卷六中收录的当时文人求官申文的奏状部的设立也可窥见一斑。他们在文章中通过运用典故、修辞手法增强文章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打动执政者以实现自己的期待。事实上《今昔物语集》中就记载了一则藤原为时凭借申文中的诗句打动了一条天皇从而获得越前国国守职位的故事。^[18]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江匡衡亦不遗余力地凭借以往的功劳申请官位,以维持大江家学问世家的家族地位。而他申请官位时可利用的最有影响力的功劳就是其侍读之劳。在《暮春应制》一诗中,他添加了自注“式部大辅为侍读者,必早升八座”^{[9]376},指出式部大辅如果担任天皇侍读,定能早日升

为“八座”官员即公卿之位。这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更是对作为帝师的自己获得天皇认可、早登公卿之位的期待。另外,他在尾张国国守任内创作的《于尾张国热田神社供养大般若经愿文》中写道:“若不奉侍读于我后,何必质朴之愚者得为尾州刺史。”^{[13]352}说自己正是因为担任了一条天皇的侍读,才得以以不才之身任职尾张国国守。这些语句都反映了大江匡衡对自己侍读身份重要性的清晰认知。

四、结 语

通过梳理大江匡衡的人生经历,可以发现侍读即帝师是大江匡衡自少年时代以来的人生目标,与自己同为帝师的桓荣获封侯位的故事符合他位列公卿的理想,催生了其“崇敬型认同”,^{[15]23}因而成为承载着他人生目标的重要载体与精神寄托。大江匡衡在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或者春风得意时,都以桓荣典故为评价标准,导致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如同後藤昭雄所说的“近乎执拗地反复运用”^{[19]53}的现象,给人造成喋喋不休的感觉。对桓荣典故的执着,可以说正是来源于其对帝师身份、公卿理想的执着。

受汉武帝在麒麟阁上画功臣图的做法的影响,在平安时代天皇日常起居的清凉殿内墙上,画有吕尚、张良、桓荣等三十二位名人的画像。天皇对吕尚、张良、桓荣的典故也应是比较熟悉的。大江匡衡在诗文中运用一条天皇熟悉的典故,无疑是唤起一条天皇的共鸣,从而得到天皇重用的一条重要途径。

根据大江匡衡的生存年代,本文考察了中国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诗文文献中桓荣典故的运用情况。对平安时代文献中桓荣典故的运用情况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古代诗文典籍及文化在被日本文人接受过程中其作用的变异。

在对桓荣典故的接受方面,桓荣典故很有可能是平安时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开始为日本文人所使用的,以大江匡衡为代表的平安时代中期的文人除了通过《后汉书》等史书接受桓荣的事迹以外,还借助《后汉书》中的论赞丰富了表达形式,进一步拓展了桓荣典故的运用。然而在中国唐代及唐代以前的文献中却看不到《后汉书》论赞中的语典。

在修辞技巧方面,大江匡衡用游戏化的表达方式化用桓荣的名字、用对句的形式罗列桓荣与张良、吕尚的典故的方式等也未见于中国文献中。另外,与中国文献中将桓荣典故作为帝王尊师的客观的历史事实相比,大江匡衡除了将桓荣的事迹作为先例之外,还将桓荣作为个人憧憬的对象,表达其个人对官位晋升以及对获得天皇礼遇的主观诉求。这不仅是大江匡衡心志的书写,同时也是平安中后期儒者文人境遇的真实写照。

[参 考 文 献]

- [1] 大江匡房. 詩境記[M]//黑板勝美.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 東京:吉川弘文館,1938:65.
- [2] 藤原実資. 小右記[M]//笹川種郎. 史料通覽. 東京:友文社,1915:285—286.
- [3] 高慧斌. 南北朝侍从讲读制度[J]. 社会科学战线,2009(7):95—98.
- [4] 范晔撰. 李贤注.《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249—1256.
- [5] 葛洪. 抱朴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01—108.
- [6] 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733—1742.
- [7] 欧阳询撰. 汪绍楹校. 艺文类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94.
- [8] 董诰.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 大江匡衡. 江吏部集[M]//塙保己一,川俣馨一. 新校群書類従. 東京:名著普及会,1977—1978.
- [10] 菅原道真著. 川口久雄校注. 菅家文草・菅家後集[M]. 東京:岩波書店,1966.
- [11]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1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033—2042.
- [13] 大曾根章介, 金原理, 後藤昭雄校注. 本朝文粹[M]. 東京: 岩波書店, 1992.
- [14] 班固撰. 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15] 林一民. 接受美学 文本·接受心理·艺术视野[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5.
- [16] 大曾根章介. 大江匡衡——一儒者の生涯[J]. 漢文学研究, 1962(10): 50.
- [17] 後藤昭雄. 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M]. 高兵兵,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3—4.
- [18] 小峯和明校注. 今昔物語集[M]. 東京: 岩波書店, 1994: 438—439.
- [19] 後藤昭雄. 大江匡衡の詩文[J]. 語文研究, 1971(31/32): 52—62.

(责任编辑: 程晓芝)

Study on the Allusion of Huan Rong in Oe Masahira's Literary Works

LV Tian-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6)

Abstract: Oe Masahira, a poet born in the Middle of Heian Period, has a high accomplishment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He borrowed the allusion of Huan Rong,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expound his situation and minds as a Shidu, a royal tutor, in his literary works. Through the allusions of Huan Rong, Oe Masahira drew the track of the fluctuation of his life and mood. Though his use of the allusions of Huan Rong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classic words and sentences, the playful expression,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other allusions between Oe Masahira's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which reflects the vari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course of acceptance in Japan. This is caused by Oe Masahira'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differences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of Heian Period in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 Oe Masahira; Huan Rong; Shidu; acceptance; variation